

緒論

一、核心問題與研究意義

本書研究目的是通過梳理「東北抗聯教導旅」（蘇聯遠東方面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¹的歷史脈絡，考察這支部隊組建、活動及解散的過程及動力，尤其是探討蘇聯在這支部隊歷史的變遷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¹ 關於這支部隊的名稱，儘管在已經公佈的抗戰時期東北黨內文件，包括周保中的日記，多有「東北抗聯教導旅」的表述，但在解密的蘇軍檔案中，並無「東北抗聯教導旅」或「教導旅」的字樣，甚至抗戰後中共中央也長期沒有採用「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名稱。1964年2月22日，新華社就周保中去世一事發佈訃告，其中沒有提教導旅或八十八旅，對周保中在抗戰期間的身份，稱為「前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總指揮」。1964年5月6日，王一知在《人民日報》發文悼念周保中，甚至避而不談周保中在1938—1945年期間的經歷。直到1982年2月，《人民日報》才第一次出現「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名稱，在一篇由王一知、王效明等親近周保中的人撰寫的紀念文章中，提到周保中曾經擔任「東北抗聯教導旅旅長」。作為接受蘇軍整編的部隊，部隊的正式名稱是「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88-я отдельная стрелковая бригада）。受戰時蘇聯遠東軍事系統調整的影響，其全稱在不同時段有所不同，1945年8月2日前稱「遠東方面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88-я осбр ДВФ）。此處「遠東方面軍」是蘇聯遠東戰役戰略軍團，組建於1938年6月28日（根據莫斯科1938年6月8日命令），至1938年8月31日被撤銷，改編為遠東兩個獨立軍，即紅旗獨立第一軍和紅旗獨立第二軍，均由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直接統率。1940年7月，莫斯科重建遠東方面軍。1942年7月，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成立，即隸屬於重建後的「遠東方面軍」。1945年8月2日，莫斯科大本營發佈命令，將「遠東方面軍」改編為「遠東第二方面軍」（8月5日完成），這支部隊的名稱改稱「蘇聯遠東第二方面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88-я осбр 2 ДВР）。1945年蘇日遠東戰役結束後，蘇聯轉入和平恢復的歷史時期。1945年10月（一說是1945年9月10日），莫斯科下令撤銷戰爭時期的「方面軍」編制，改為和平時期的「軍區」編制。遠東地區一共設立了三個軍區。其中，以原遠東第二方面軍為核心，設立「遠東軍區」（ДВ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司令部設於南薩哈林斯克，軍區司令為原遠東方面軍司令（1945年8月5日後擔任遠東第二方面軍司令）普爾卡耶夫大將。1945年10月，下令解散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則是遠東軍區司令部。周保中日記裏稱「蘇聯工農紅軍獨立步兵旅第八十八旅」。1986年中共中央以正式文件形式轉發的《1985年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問題座談會紀要》中使用的是「蘇聯遠東方面軍步兵第八十八旅」。以上兩種稱呼都是不太準確的。除了直接引用的東北黨內文件的表述外，本書敘述中統一稱「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東北抗戰拉開帷幕。及至 1930 年代中期，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游擊隊，聯合東北戰場上的抗日義勇軍、抗日山林隊等，組編為東北抗日聯軍（以下簡稱「東北抗聯」），人數一度達到三萬¹。自 1938 年，東北抗日游擊運動陷入低潮，至 1940 年底，東北抗聯已不足千人，相繼退入蘇聯整頓。1942 年 7 月，在遠東蘇軍主導下，以越境入蘇的東北抗聯為基礎，組建了「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隸屬於蘇聯遠東方面軍司令部。1945 年 9 月，根據遠東蘇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周保中、金日成分別率領旅中原東北抗聯中、朝（族）官兵，前往中國東北和朝鮮蘇佔區協助蘇軍維持秩序。1945 年 10 月，蘇聯遠東軍區司令部正式下令解散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本書主要關注「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即 1942 年 7 月接受蘇軍整編而建立的部隊。

本書研究時段為 1938—1945 年。之所以由 1938 年講起，原因有二。其一，從東北黨與東北游擊運動的發展來看，1938 年是一個關鍵的節點。這一年，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由盛轉衰，開始陷入低潮直至難以維繫；與此同時，中共東北黨組織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失去聯繫，至此與中共中央的聯繫全部斷絕，成為事實上的「化外黨」。其二，從對蘇關係來看，大致是從 1938 年初，東北黨各方開始積極謀求同蘇方的接洽，爭取蘇方支持與援助；與此同時，斯大林開始思考調整蘇聯的遠東戰略，新確立的戰略框架就包含了與東北抗聯建立聯繫的內涵。

本書關注議題的研究價值在於：第一，從中共黨史的視角，東北黨長期脫離中共中央的領導（斷絕全部聯繫將近八年），期間接受聯共黨領導，這在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第二，東北抗聯官兵在蘇軍主導下以獨立旅的形式編入蘇聯遠東方面軍序列，部隊的指揮系統、後勤、訓練及戰鬥內容，均由蘇

軍主導，為蘇聯遠東內務與軍事部門從事情報工作，事實上已經成為遠東蘇軍一支特種部隊，這在中國近現代軍事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第三，在蘇聯整訓期間，金日成從一名東北抗聯中階軍官成長為莫斯科的「天選之子」，抗戰勝利後更是被蘇軍指定帶領原東北抗聯朝鮮（族）官兵返回朝鮮蘇佔區，在駐朝蘇軍扶植下進行建黨、建軍、建國工作，並在此後決定性地主導了北朝鮮政權的歷史變遷。

其學術意義包括兩方面：第一，彌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基於對多方史料甄選與考證的基礎，本書相對完整地揭示了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創建、參加遠東戰役以及最終解散的過程，在重新構建基礎史實的過程中，考察了這支部隊與蘇聯和中共中央的複雜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改觀了關於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問題研究薄弱的局面。第二，增進了對二戰遠東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認知。作為一支受蘇聯遠東方面軍司令部直接領導，由中、蘇、朝三國人員組成的「特種部隊」，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本身就是二戰遠東中、蘇、朝三國人民協力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重要展現。就這一層意義而言，考察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歷史，不僅能夠加深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認識，還能夠增進對二戰期間遠東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理解。

本書的研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習近平指出，「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八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 14 年抗戰的歷史，14 年要貫通下來統一研究」。若以「九一八事變」作為抗戰起點，那麼中共領導的東北抗聯游擊戰爭則是集中體現。本書的研究，有助於正確認識中共在抗戰期間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本書也充分展現了以周保中為首的東北黨領導人獨具的「抗聯精神」，這不僅體現於他們在「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的極端艱苦條件下堅持抗戰的英雄氣概，更體現於他們在與中央斷絕全部聯繫後，始終對中國革命事業忠貞不渝的堅定信念。這些精神對於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1 關於東北抗日聯軍成立時間問題，一般有 1935 年和 1936 年之說。實際上，1935 年出現「東北抗日聯軍」主要是輿論宣傳，並未完成部隊改編。1936 年初，東北各地抗日武裝才陸續改稱「東北抗日聯軍」。1985 年 7 月丹東會議紀要即使用的 1936 年之說，稱「一九三六年二月，東北人民革命軍聯合其他反日部隊，發表統一建制宣言，改稱東北抗日聯軍，陸續編成十一個軍，最盛時期共達三萬餘人，形成東南滿、北滿和吉東三個較大的游擊區」。

二、文獻綜述與史料運用

學術界關於 1938 年以後東北抗聯歷史的研究總體上較為薄弱，對期間蘇聯與東北抗聯的互動關係仍未開展針對性的研究。

中共中央對關於東北抗聯歷史的關注始於 1945 年¹，但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是在新中國成立後開始的。只是中共中央不僅長期沒有對東北抗聯的功過是非做出結論，對抗聯幹部的任用也始終比較謹慎。在此背景下，加之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東北抗聯歷史的著史工作長期停滯不前，一度成為禁區。直到 1980 年代末，國內外仍沒有任何一部完整的東北抗聯史著。

1970 年代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關於東北抗戰史的不實敘事引起中共中央關注。得益於當時黨史研究整體繁榮的背景，東北抗聯史的研究與編史工作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關注，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最重要的成果，一是由中央檔案館與東北三省檔案館聯合編纂的《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編》（內部印行），時至今日仍是東北抗聯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二是《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1991 年公開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完整的東北抗聯史著。

遺憾的是，無論是史料彙編還是史著，對 1938 年以後東北抗聯史的著墨甚少。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包括：第一，不了解情況。當時主要相關領導同志都已經逝世，餘下當事人多不知內情，對接受蘇軍整編與情報工作多是

道聽途說¹。第二，對相關問題有爭議。畢竟，東北抗聯退入蘇聯不僅沒有得到中共中央或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也違背了當時中共中央抗日救國的基本方針。此外，得到休整的抗聯官兵為何沒有立即重返東北戰場？東北黨為何遲遲沒有同中共中央重建聯繫？其與蘇聯遠東軍事與內務機構建立了何種性質的關係？東北黨為何會接受蘇軍整編並為蘇軍做情報工作？蘇方在戰後遣返東北抗聯官兵的真實目的是什麼？等等。學界與黨內關於這些問題長期存在不同看法。1980 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對越境問題做出的正式結論係「戰略性轉移」，但並未平息相關的歷史爭論。

目前學界關於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研究，大致有三種視角：

第一，中共黨史的視角：以中共黨史或中國革命史為主線，把蘇聯、共產國際與東北游擊運動、東北黨的複雜互動做簡約化處理，有意或無意地規避蘇聯因素，或是倒置當時共產國際、聯共與中共的胎生關係和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關係；在敘事上多未脫離陳舊的路線鬥爭窠臼。

這一視角下的研究，多將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上限確定在 1940 年吉東、北滿兩省委的伯力會議（即第一次伯力會議），強調東北抗聯在退入蘇聯整編、整訓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最權威的兩本史著《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1991 年，人民出版社）²與《東北抗日聯軍史》（2015 年，中共黨史出版社）³都有體現。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東北黨史專家譚譯、李鴻文、常好禮、趙

1 這一時期中共主流《解放日報》《東北日報》《新華日報》以及新華社，都系統、連續地刊登或播發了東北抗日聯軍的歷史。比如：《周保中將軍答本報記者問 闡述抗日聯軍鬥爭簡史及對東北建設意見》，《東北日報》1946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發言人談東北概況 重申我黨對東北問題主張 和平民主團結建設》，《解放日報》1946 年 2 月 14 日；社論：《重慶事件與東北問題》，《解放日報》1946 年 2 月 25 日；《中共領導抗日聯軍在東北苦鬥十四年》，《解放日報》1946 年 3 月 11 日；《艱苦卓絕十四年 周保中將軍縱談東北抗戰歷史與現勢》，《解放日報》1946 年 3 月 12 日；《堅持十四年東北抗戰領袖 周保忠將軍談東北形勢》，《新華日報》1946 年 3 月 14 日等。

1 王效明、李荊璞等人 1982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紀念周保中的文章指出：「1942 年至 1945 年，抗聯主力部隊調東北邊境地區整訓」。（參見：王效明、李荊璞、彭施魯、王一知：《肝膽照千秋 精神感萬民 —— 憶東北抗日游擊戰爭時期的周保中同志》，《人民日報》1982 年 2 月 4 日。）

韓光等人追念柴世榮的文章更為模糊，僅稱「抗聯主力隱蔽整訓」。（韓光、王一知、朱光、王效明、季青：《無畏的民族英雄 我黨的忠誠戰士 —— 追念柴世榮烈士》，《人民日報》1982 年 7 月 8 日。）

2 《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 《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 年。

亮、趙俊清、高樹橋等人還推出了一批頗有特色的專題研究¹。其中高樹橋的《東北抗日聯軍後期鬥爭史》，運用大量中方檔案集中梳理了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脈絡²。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術界有些新的研究動態。王連捷就對東北抗聯退入蘇聯是「戰略轉移」提出懷疑，但堅持這是東北抗聯的主動抉擇³。管廷輝提出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評價問題，認為這一階段是「帶有特殊含義的抗日游擊戰爭」⁴。

有些學者也關注到蘇聯因素，但缺少對蘇聯一方決策與行為的描述，尤其缺乏來自俄羅斯檔案的互證。王連捷、王惠宇、張瑞生、張泓、邵雍等人考察了東北抗聯與蘇軍的合作，但對蘇方的政策與行為着墨甚少，且缺乏俄方史料的支撐⁵。金興偉梳理了東北抗聯後期歷史脈絡，提出蘇聯與東北抗聯「都在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但作者沒有使用俄文史料佐證，對蘇方的描述也頗為不足⁶。除此之外，國內學界的大量研究是進行意義解讀或「東北抗聯精神」闡釋，大多數很難稱得上是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

第二，國際史的視角：東北抗聯後期鬥爭階段不僅有中、朝官兵參加，也吸收了蘇軍官兵，被編入蘇聯遠東方面軍序列，是二戰期間遠東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體現。這種「國際史」的特徵，已經引起中朝關係史、

中蘇關係史與冷戰國際史等領域學者的關注。

沈志華教授運用中、蘇、朝三方史料，梳理了東北抗聯後期的若干歷史脈絡，試圖揭示二戰後期遠東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及中、蘇、朝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研究儘管如作者所說只是「初探」，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首次將「國際史」「多國檔案互證」等冷戰國際史領域的觀念、概念及研究方法引入了東北抗聯史的研究¹。閔庚賢（민경현）與卡特舍夫采娃（Е.В. Катывцевая）運用最新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考察了金日成在蘇聯整訓期間從一名東北抗聯中階軍官，成長為東北抗聯朝鮮（族）官兵政治主導人物的歷史過程²。戈爾布諾夫（Е. Горбунов）考察了東北抗聯與蘇聯遠東軍在情報領域的合作，但研究關注時段只是1930年代後期。

國際史視角下的研究為東北抗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機，然而，主要受到史料與研究者旨趣的影響，相關研究整體上還處於初探階段，成果仍不多見。正是由於史料不夠多元與系統，對基礎史實的還原仍存在重大不足，由此，關於許多重大爭議問題仍眾說紛紜，做出的論述也多既不能全面反映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演變脈絡，對這支部隊牽涉的中、蘇、朝三國共產黨人的複雜互動，也無法做出準確理解與判斷。

第三，對東北抗聯朝鮮（族）官兵的研究：二戰結束後，以金日成為首的返回朝鮮蘇佔區的東北抗聯朝鮮（族）官兵，成為主導朝鮮政壇的最重要的政治勢力的事實，使得這支部隊成為觀察朝鮮國內政治、中蘇朝關係、以及東北亞國際格局緣起與變遷的重要維度。

圍繞這一視角，中方研究者普遍遵守中共中央關於東北抗聯是「中朝聯合軍」的指示³。國際學術界與一些中國朝鮮族學者，則關注以金日成為首的游

1 比如潘喜延等：《東北抗日義勇軍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譚譯主編：《東北抗日義勇軍人物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陸毅、王景主編：《中國共產黨東北地方組織的活動概述：1919.5—1945.10》，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劉文新、李毓卿：《周保中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劉楓：《李兆麟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趙亮、紀松：《馮仲雲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常好禮：《東北抗聯路軍發展史略》，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高樹橋：《東北抗日聯軍後期鬥爭史》，瀋陽：白山出版社，1993年；趙俊清：《趙尚志傳》《楊靖宇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2 高樹橋：《東北抗日聯軍後期鬥爭史》，瀋陽：白山出版社，1993年。

3 王連捷：《東北抗日聯軍後期鬥爭若干問題的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4期。

4 管廷輝：《論東北抗聯後期鬥爭的作用與地位》，《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5 王連捷：《論東北抗日聯軍後期與蘇聯遠東軍的關係》，《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王惠宇：《東北抗聯與蘇聯遠東軍對日軍事偵察活動》，《長白學刊》2015年第6期；張瑞生：《1941—1945年蘇聯遠東軍與中國東北抗日聯軍關係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張泓：《東北抗日聯軍與蘇聯遠東軍的軍事合作》，《黨史縱橫》2005年第8期；邵雍：《「抗聯」教導旅初探》，《史林》2015年第4期。

6 金興偉：《1940年後的東北抗聯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1 沈志華：《試論八十八旅與中蘇朝三角關係——抗日戰爭期間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6頁。

2 E.В. Катывцевая, Мин Кён-Хён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учёба в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е и Ким Ир Сен (1942-1945 гг.)// ИСТОРИЯ, 2018№ 9, сс101-122.

3 參見兩本最權威的史著：《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關於中共中央「中朝聯合軍」認知的形成，本書在附錄部分有專門論述。

訪的檔案館大都聲稱已將東北抗聯史檔案定為「歷史檔案」（1949年以前的都是），按要求永久封存。省一級檔案館多少冠冕堂皇一些，給出的拒絕理由是「正在整理」或「技術原因」，至於什麼時候整理好，則諱莫如深。檔案館工作人員普遍對查檔者重重刁難，甚至直接拒之門外。與檔案館相比，各級黨史研究機構的態度稍好一些，只是普遍存在自留地觀念。著者在某省委黨史研究室時，負責黨史資料的處長明確宣稱：「我們單位的所有資料從不對外人提供」。至於何謂「外人」，她的回答簡單明了：「不屬於我們黨史研究室的人都是外人」。

平心而論，東北抗聯史幾乎不涉及中央層級的領導人（只有王明、康生），而且大部分檔案已經在1980年代刊印成冊，雖說在當年是內部印行，現在也已「飛入尋常百姓家」，普通研究者只要用心蒐集並不難獲取。反而是很多黨研機構固步自封，甚至將《東北地區歷史文件彙編》視為鎮館之寶、鎮「室」（黨史研究室）之寶，不僅自己不看、不研究，也不向研究者提供¹。然而，現今那些有關東北抗聯史的粗製濫造的成果，絕大部分也是出自這些機構之手，造成了嚴重混亂。2015年7月21日某大報刊發的一篇文章《神祕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就是其中的典型，文中關於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描述嚴重背離了歷史真相，因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刊發時間（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刊發載體，造成的影響極為惡劣²。

除了仍被封存於中國各級檔案館與俄羅斯相關檔案館的部分檔案，許多涉及到這支部隊歷史的檔案據信已經被銷毀。1945年底，新成立的蘇聯遠東軍區司令部在解散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過程中，就下令燒掉了四十多卷帶有密級的公文、命令、報告、統計簿等檔案³。在之前的1945年7月，在遠東

戰役爆發前夕，蘇聯遠東方面軍還指示周保中燒毀了有關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在蘇聯整訓期間的大部分檔案¹。新中國成立至今，儘管出現許多原東北抗聯老戰士或者他們的後代發表的大量回憶性史料，但由於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主要領導人，只是中下層官兵，對部隊歷史的了解既不完整也不全面，關於很多事情的描述斷斷續續、支離破碎，甚至夾雜了一些道聽途說的內容，需要謹慎甄別。

全書運用到的史料主要包括三類：

第一，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中央檔案館和東北三省檔案館聯合編纂的《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這是目前可見的最權威、最系統、以及比較全面的東北地區革命歷史原始檔案匯集，全書共七十卷，約一千五百萬字，是東北地區革命史與抗日戰爭史研究必備的案頭書。本書即系統使用了《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收錄的相關檔案，包括各類函電、指示、報告等等。

第二，新近發掘的俄羅斯解密史料。大致包括三類：

（一）俄羅斯國防部檔案館保存的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在蘇整訓、戰後派遣及最終解散的材料，這一批檔案是由Ивано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²將軍出面拷貝的，史料價值很高。由於伊萬諾夫將軍已經病逝，而俄羅斯國防部檔案館仍未解密，這一批檔案更顯得彌足珍貴。

（二）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保存的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卷宗，包括周保中、楊松、陳潭秋等人個人卷宗。包括東北黨代表在莫斯科的彙報與共產國際的分析，特別是在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組建前夕共產國際幹部對周保中、崔庸健（崔石泉）等重要領導人的鑒定報告。

（三）俄羅斯出版的檔案集中披露的二戰期間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內務人民委員部與遠東邊疆區各級相關部門情報往來、發出的指示、提交的各類

1 比如遼寧省檔案館就將這一套檔案集界定為「限制使用」「不適合開放」的級別。該館負責人對這套檔案集制定的使用原則是「別人開放了是別人的事，但是不能從我們這裏把這個東西流出去」。至於館藏的東北抗聯檔案的開發，該館負責人稱，「館裏都是要審查（審核）很多次的」。這裏所謂「審核」，主要是由館內工作人員審核，而不會交由館外人員負責。參見：對該館工作人員的訪談紀要。轉引自李恕：《遼寧省檔案館館藏抗聯檔案信息資源開發現狀及策略研究》，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4月。

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神祕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人民日報》，2015年7月21日。

3 ЦАМО, ф.1896, on.1, л.2, л.112-115об.

1 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42年1月—1945年8月）》，1991年，內部印行，第474-475頁。

2 伊萬諾夫，1921年11月17日出生。1944年12月末被派到位於哈巴羅夫斯克的軍事情報機構。1945年5—6月到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野營駐地。新中國成立後，伊萬諾夫曾經擔任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1970—1974）。

彙報、以及各類分析報告等等，其中包括蘇方對蘇「滿」（以及蘇朝）邊境地區的形勢研判、對遠東軍事形勢與日軍動向的判斷，對日情報偵察與作戰部署、東北地區游擊運動的分析與考慮等。

第三，口述史料。比較重要的有周保中日記，周保中、馮仲雲、于保合在新中國成立後接受黨史工作者的訪談，金日成回憶錄，陳雷回憶史料（著者在陳雷老人家中拍攝），以及季青、彭施魯、王一知等人的口述資料。如同大多數口述史料一樣，這些資料也存在傳主誤記、錯記的現象，出版過程中也經過了相關人員（包括編輯人員）「為尊者諱」「為死者隱」進行的增刪或改動，需要與其他史料佐證¹。此外，除了周保中，其他人大都不是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主要領導人，既不曾參與當日與蘇軍方面的互動，更不掌握全般的情形，很多記憶都不是親身經歷，而是道聽途說甚至想像猜測，當然，也有一些是基於各種考慮憑空捏造的內容。

此外，著者也運用了一些日偽情報檔案。

研究過程中，著者致力於在充分的檔案史料基礎上進行歷史的實證研究，力求去偽存真，重建與重新理解有關這段歷史的基礎史實。

三、研究創新與基本觀點

本書關注對象是「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目的是通過梳理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組建的緣起、發展以及最終解散的歷史，探討蘇聯在這支部隊歷史的變遷中扮演的角色。與以往研究相比，全書致力的創新之處在於：

第一，在研究視角上，全書的關注點聚焦於「蘇聯因素」，即考察蘇聯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東北黨及東北抗聯後期歷史變遷發揮的重要作用。相比於以往研究避而不談或淡化「蘇聯因素」的現象，這是本書在研究視角上的創新。在敘事過程中，本書將東北抗戰置於蘇聯遠東戰略演變的框架內，希

望主要從蘇聯視角重新審視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系統考察與揭示「蘇聯因素」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以及東北抗聯歷史變遷究竟發揮了何種關鍵的影響。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書是以多邊原始檔案為基礎，進行的歷史學的實證研究，重史料與史實的考據，努力以多邊、多種類原始檔案的甄別、比對與考證為基礎，重建東北抗聯後期歷史的基本脈絡，重新考察期間一系列關鍵事件、重要人物與重大決策的緣起、進程及結果。

第三，在研究史料上，本書致力於兩點突破，一是首次系統運用了來自俄羅斯檔案館的解密史料，包括來自俄羅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與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的原始檔案；二是系統運用了1980年代編纂的《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編》，並結合新近發掘的東北地方各類口述、回憶、日記等資料。這些檔案對於釐清許多重大問題、推進相關研究的深入，有重要作用。

通過對史料的梳理與解讀，全書的基本觀點如下：

第一，1938年夏至1939年春，莫斯科調整了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政策，背後是蘇聯遠東戰略的重大變化。這一變化的直接動因是1938年6月「留希科夫事件」的爆發。此後至1939年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與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聯名簽發給遠東內務與軍事系統關於援助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指示，目的是利用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重建遭到破壞的蘇聯遠東情報網絡，應對日益上升的戰爭危機。正是這一時期，東北游擊運動開始得到蘇聯方面的援助，而蘇聯因素也開始成為主導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乃至中共東北黨和東北抗聯歷史變遷的基本力量。理解1930年代末蘇聯遠東戰略的變化，是理解東北抗聯後期歷史進程中「蘇聯因素」的關鍵。

第二，為有效實現對東北抗日力量的控制與利用，蘇聯方面發起了東北抗聯歷史上著名的兩次伯力會議。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伯力會議上，蘇軍不僅依照自身戰略需求確定了與東北抗聯互動關係模式，還要求東北抗聯領導人轉變鬥爭策略，將保存實力以及以小部隊形式為蘇軍開展情報工作作為主要任務。通過召集1940年底至1941年初的第二次伯力會議，蘇軍完成了

¹ 據陳雷回憶，1965年春，李范五應王一知的要求，將季青從黑龍江臨時調到北京，在王一知、王效明指揮下修改了周保中東北抗聯日記的原始記錄。季青返回黑龍江後曾向陳雷有當面彙報。

對東北黨主要幹部的調查和甄別，還強行將他們控制在蘇聯，由此不僅消除了東北抗聯被日軍情報機構利用的風險，也為後來派遣他們從事情報偵察工作奠定了基礎。此舉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造成了全局性的消極影響。

第三，要求參會人員「停止派遣」，是蘇方召集的第二次伯力會議的一部分。這一要求的提出是蘇方自 1939 年以來遠東戰略調整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根本目的就是加強對東北抗聯及東北游擊運動的控制。基於這一結論，可以對中共黨史上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做出新的界定，即東北抗聯退入蘇聯的行動既不是「流寇主義」，也不是「戰略轉移」，而主要是受了蘇方的壓力，是蘇軍基於自身戰略需要精心策劃的結果。「停止派遣」在中共東北黨和東北抗聯幹部中間引發了普遍的不滿，周保中最終決定在保持中共黨政治與組織的獨立性的基礎上接受蘇方要求，主要考慮則是在日益嚴峻的東北抗戰局勢下，保存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有生力量。

第四，1941 年蘇德戰爭的爆發對東北黨領導人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開始將「保衛蘇聯」視為與中國抗戰事業同等重要的任務，明確請求蘇方將東北抗聯官兵併入蘇聯遠東方面軍，由蘇軍司令直接指揮。蘇方拒絕了周保中的提議，反而要求東北黨繼續保持政治與組織的獨立性。理解蘇軍這項決策的一個視角，是莫斯科此時正通過蘇軍總參謀部與共產國際等渠道敦促中共中央加強東北工作，並派主力部隊到東北部開展對日軍牽制作戰，以降低日軍北上進攻蘇聯的可能。只不過，莫斯科與中共中央的溝通並不順暢，中共中央在認真權衡各種現實條件與自身的力量後，拒絕出兵東北。在此之後，莫斯科不再敦促中共中央加強東北工作，轉而加強了對東北抗聯的控制，並拒絕向中共中央透露東北抗聯的下落。

第五，1942 年 7 月蘇方突然主導組編了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蘇方儘管在形式上保留了中共東北黨的組織和政治獨立性，實際上則是通過一系列機制的設立、人員職務的任命等措施，完全控制了這支部隊。蘇方突然整編部隊，有加強對日情報工作的考慮，更重要的是着眼於當時被認為極有可能爆發的蘇日戰爭，因此對新組編的旅的定位也是「作戰軍的偵察聯絡小隊」。以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組建為標誌，東北抗聯正式併入蘇聯遠東方面軍，部

隊人事、行動、後勤、裝備、組織、訓練等工作均由蘇軍代表主導，最高指揮權也掌握在蘇軍手中。步兵旅成立之後，主要工作不再是返回東北地區堅持抗日游擊與宣傳工作，而是保衛蘇聯遠東邊界的安全，防範日本進攻蘇聯。

第六，關於 1943 年「停止旅內派遣」問題。小部隊活動主要發生在 1943 年以前，主要認為是為蘇軍做情報工作，也進行黨的工作與抗日宣傳。小部隊活動到 1942 年底基本停止。1943 年春，遠東方面軍總司令明令要求「停止旅內派遣」，即嚴禁編入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人員前往中國東北從事任何與中共或東北游擊運動有關的活動。這一政策轉變的背後既有蘇聯遠東方面軍最高統帥易人的因素，也與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互動有關。無論如何，蘇軍命令「停止旅內派遣」的客觀結果之一，乃是這支被併入蘇軍系統的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完全被蘇軍控制，基本中斷了與中共和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

第七，關於東北抗聯參加遠東蘇日戰役。本書通過梳理蘇日戰爭前後旅內人員數量的變化、遠東蘇軍總部關於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問題的命令與指示、周保中給蘇軍代表的書信，以及遠東蘇軍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官兵的嘉獎命令等，論證得出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官兵並未參加 1945 年 8—9 月的蘇聯對日作戰。儘管周保中及全旅官兵確曾為參加遠東戰役做了準備，也表達出強烈的參戰意願，但全旅官兵並沒有參加作戰行動。著者還論證得出，對於蘇日遠東戰役的爆發，周保中事前並不知情，更沒有如金日成所述，二人一同前往莫斯科參加總參謀部作戰會議。

第八，關於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中朝（族）官兵的派遣問題。派遣並非周保中及東北黨委員會討論決定的，而是蘇軍的「一紙令下」。二戰後蘇聯遠東戰略與對華政策是建立在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的和平與統一基礎之上，斯大林承諾將幫國民黨政府恢復對中國東北的主權和行政。至少在 1945 年 8 月底 9 月初，無論是莫斯科還是遠東蘇軍，都不曾預見後來那種中共中央派人進入東北的情形，更絲毫沒有幫助中共奪取東北的意圖，更不曾設想將在北朝鮮扶植金日成政權。遠東蘇軍派遣旅內原東北抗聯官兵的目的，是要他們到中國東北與朝鮮蘇佔區，協助當地蘇軍建立與維持秩序，並未賦予他們建

黨、建軍或建政的使命。

本書通過考察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整個歷史，認為蘇聯對這支部隊的歷史變遷發揮了至關重要，乃至決定性的作用。蘇方政策行為的基本邏輯是確保自身遠東國防安全，防範潛在的蘇日戰爭。本書不否認以周保中為首的中共東北黨領導人對黨和中國革命事業的忠誠信仰，只是強調來自蘇聯的因素對這支部隊後期歷史的變遷發揮了更具決定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東北抗聯後期鬥爭史，實際上可視為莫斯科遠東戰略不斷調整的縮影。如若忽略這一點，忽視蘇聯因素對這一歷史進程所發揮的作用，或是單純以中國革命史或東北抗戰史作為敘事主線，那麼，對在此期間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理解與描述必定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由此建構的歷史敘事鏈條也很難實現最基本的邏輯自洽。

限於史料掌握不足，本書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部分重要問題的探討並不充分，其中包括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第一，關於 1943 年夏至 1945 年 8 月遠東戰役爆發，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在蘇整訓及偵察活動。關於這些活動，目前缺乏足夠的史料，原因在於：

1. 自 1943 年共產國際解散後，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完全隸屬於蘇聯遠東方面軍，相關檔案多保存在俄羅斯國防部檔案館，尚未解密。
2. 1943 年春，遠東方面軍總司令嚴令禁止旅內人員返回東北從事與中共黨相關的組織與宣傳活動，完全控制了這支部隊；在由蘇軍控制偵察情報的過程中，遠東方面軍對旅官兵做出了極為嚴格的保密規定。蘇日戰爭爆發前，蘇軍和周保中都曾批量燒過檔案。從蘇聯回國之後，周保中及旅中其他領導人都不曾留下可靠的口述資料，流傳的說法大多是道聽途說。
3. 自 1980 年代以來，權威部門出版的東北抗聯史論著對這段歷史基本是規避的，甚至不提「蘇聯因素」。著者目前也只掌握寥寥幾份檔案，不足以揭示在此期間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基本活動及其特徵。

第二，關於東北抗聯歷史上的「朝鮮因素」。本書儘管專闢一章論述，但也只是很粗淺的梳理，關於金日成的崛起，以及蘇聯與東北抗聯朝鮮（族）官兵的互動，仍然缺乏足夠的史料。目前唯一可以證實的是，在蘇聯整訓的

經歷對金日成的成長，特別對其在抗聯朝鮮（族）官兵中政治主導地位的確立，以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壇上「游擊隊派」的形成產生了極為關鍵的影響。在 1940 年秋越境蘇聯之前，金日成無論是在中共東北黨內，還是抗聯軍中，都不是主要負責幹部〔在朝鮮（族）幹部中也不是地位最高的〕，更不為共產國際或遠東蘇軍負責人熟知。然而，1945 年 9 月返回朝鮮之際，他已經是抗聯朝鮮（族）工作團負責人，成為其中最重要的幹部。探討金日成在蘇聯整訓的經歷，特別是以他為核心的「游擊隊派」的形成，對理解戰後朝鮮局勢走向與未來朝鮮內部權爭與政爭有重大意義。但相關研究的展開，仍需要更多史料的發掘。

第一章 莫斯科調整遠東政策與東北 抗聯退入蘇聯（1938 — 1941）

1938年，東北抗戰形勢由盛轉衰，中共東北黨組織在同中共中央斷絕全部聯繫後，陷入內爭不斷、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的局面。大致從這一年開始，中共東北黨與東北抗聯領導人開始不斷越境蘇聯尋求援助。同一時間，國際與遠東地區形勢都出現了嚴峻的變化，蘇聯面臨的戰爭危機加劇。1938年爆發的留希科夫叛逃事件則直接推動了蘇聯遠東戰略的調整。基於對形勢的研判，尤其是為應對日益加劇的遠東戰爭危機，斯大林開始思考並着手調整遠東戰略，新確立的戰略框架包含了加強與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互動的內容。1938年底1939年初，根據莫斯科的指示，遠東蘇軍開始加強對東北游擊運動的工作，「蘇聯因素」開始成為主導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乃至中共東北黨和東北抗聯歷史變遷的基本力量。

一、莫斯科調整遠東戰略與援助東北抗戰

1930年代，蘇聯遠東戰略的基本目標是確保與日本的和平關係，降低遠東方向的戰爭威脅。尤其是歐洲局勢日趨惡化極大牽制了斯大林關注遠東方向的精力與意願。「九一八事變」的三個月後，蘇聯政府就向日方正式提議締結蘇日互不侵犯條約。1932年3月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成立後，蘇聯政府再次提出訂立蘇日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強調若日本政府同意締約，蘇聯將正式承認偽滿政權，並同偽滿政權訂立同樣性質

的條約¹。或許正是為了表達和平友好的誠意，蘇聯政府還強行關閉了在蘇聯遠東地區的中國領事館，代之以偽滿政權在當地建立的領事館，甚至正式與日偽滿啟動關於出售中東鐵路的談判並最終於1935年3月23日在東京同日偽滿政權正式簽署出售鐵路的協議。這份協議指明蘇聯的交涉對象是偽滿政權，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政權是主權國家²。

1935年出售中東鐵路的協議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更違反了1924年的《中俄關於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下文簡稱《協定》）。根據1924年《協定》，中俄兩國政府明確保證不得簽訂有損締約另一方的主權和利益的條約或協定，即中俄任何一方均不得同第三國簽訂有損於另一方的協定。1924年《協定》還規定，中東鐵路屬於中俄合辦，這條鐵路的前途只能由中蘇兩國共同決定，不允許第三方干涉。在嗣後與東北地方當局訂立的《奉俄協定》中同樣有此規定，即「締約雙方彼此同意，東省鐵路之前途只應由中國及蘇聯兩國取決，不准第三者干涉」³。鑒於日本自「九一八事變」挑起侵華戰爭，蘇聯同日本簽署出售這條鐵路的協定，已然違反了自身承諾與國際道義。

斯大林對中國之背信棄義，尤其是將自19世紀末就承載了俄國遠東戰略命脈的中東鐵路賤賣給自己的宿敵，並沒有換來預期的收效。幾乎整個1930年代，日本政府始終拒絕莫斯科提出的關於訂立兩國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關於日本政府這一行為的邏輯，大致可從三方面理解：第一，日本政府當時並不將蘇聯視為在遠東方向的主要威脅，認為蘇聯既沒有對日發動進攻的能力，也缺乏挑起戰爭的意願，與蘇聯訂立互不侵

犯條約缺乏現實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第二，日本政府擔心同蘇聯訂立條約極有可能會刺激英美兩國；第三，與蘇聯簽約還可能在日本國內引發不良的影響，不僅不利於日本國內的防範共產主義的政策，還有可能激化日本政府內部的路線之爭。

1930年代中後期，日本在遠東侵略步伐的加快，加劇了莫斯科對戰爭的擔憂。1936年8月11日，日本軍方通過「國策基準」，明確將蘇聯遠東軍作為假想敵，提出為對抗蘇聯遠東軍，尤其是在戰爭爆發伊始就迅速佔據優勢，必須充實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的駐軍¹。11月25日，日本與德國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即《防共協定》），約定對於共產國際的活動相互通報且緊密合作²。與此同時，在中國東北與朝鮮的日本侵略軍開始在中蘇邊境、蘇朝邊境地帶頻頻製造事端。面對遠東日趨緊張的戰爭形勢，並考慮在歐洲推動構建集體安全體系始終不得進展的現實，斯大林儘管仍未徹底放棄同日本交好或中立日本的願望，卻已經不得不重新思考與調整遠東的戰略佈局。新戰略的基本目的，是確保中國能夠打下去，將日軍拖在中國戰場，儘可能降低其北上進攻蘇聯的危險。

斯大林採取的第一步，仍是對中國背信棄義，即在1936年3月12日與蘇聯人扶植的外蒙古分裂政權簽訂互助議定書。這份互助議定書是一份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同盟條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條，蘇聯或蒙古如受第三國家或政府之攻擊威脅應立即共同考慮發生情形，並採用防衛及保全兩國領土所必需之各種辦法；第二條，締約國任一方遭受軍事攻擊時，另一方將提供各種援助，包括軍事援助；第三條，締約雙方可以相互駐軍³。由此，這份互助議定書不僅違反了1924年《協定》的內容，

1 [日]林三郎編著，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日本問題研究室譯：《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27頁。

2 《抗議蘇聯私售中東路照會》，載唐屹等編：《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一冊（東北卷）》，台北：「中華民國外交部」編印，2001年，第92-93頁。

3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1924年5月31日），唐屹等編：《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一冊（東北卷）》，台北：「中華民國外交部」編印，2001年，第74-76頁。

1 [日]日本歷史研究會：《太平洋戰爭史》第2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226頁。

2 《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第111-112頁。

3 《蘇蒙互助議定書》（1936年3月12日），《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一冊，東北卷》，第201-202頁。